

何塞·马努埃尔·卡瓦耶罗·伯纳德

卡瓦耶罗·伯纳德:不安定的文学骑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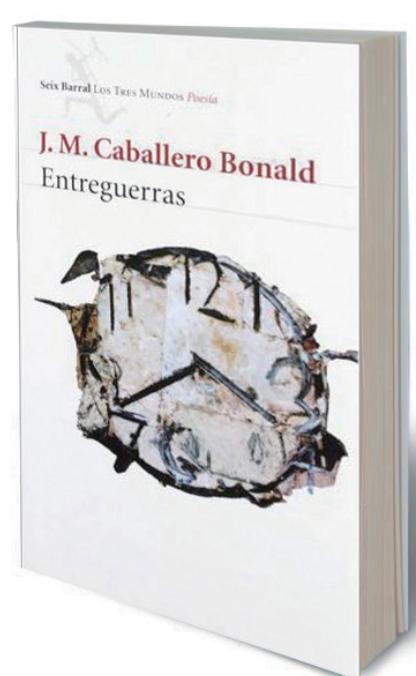
□汪天文

文化,狂热地/安上身份等级”,如同“用石头雕刻石头”。而此刻,作为西班牙人,卡瓦耶罗·伯纳德体会到的只有“幸存的记忆里/某段重现/混杂着麻木与羞涩”。

1964年,卡瓦耶罗·伯纳德回到西班牙,先后在多家出版社任职,并因政治原因几番被捕。1969至1970年间,卡瓦耶罗·伯纳德出版了一册诗歌合集取名《活着为了讲述》。书名得上是对他创作信仰的精妙概括,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卡瓦耶罗·伯纳德坚持以语言作为惟一的武器追求生命与写作的自由。相信只有自由的语言才能摇醒昏睡,打动良知。无论是诗歌中的呐喊,还是小说中对西班牙风土民情的讲述,抑或是弗拉门戈专著中明艳的招式,无不体现出他的反叛与责任感。他用作品号召读者走出自已,分享一场用词语寻找个体与社会生命新空间的旅程,正如《日常重遇》中所写每一日自我制造的信仰,“我唯独是/我的自由和我的词语。”在塞万提斯奖的获奖感言中,卡瓦耶罗·伯纳德也特别忆及意大利诗人帕维泽,并以此强调自己相信诗歌“是一种抵抗生命中冒犯的防御方式”,“我们永远要用语言捍卫自己,抵抗那些想要剥夺我们的话语的人”。

进入80年代之后,卡瓦耶罗·伯纳德将更多精力投入小说、风俗散文与文论的创作中,先后出版了《红酒简记》《加迪斯的山与海》《安达卢西亚》《西班牙:节日与风俗》《塞万提斯的塞维利亚岁月》等著作。新千年以来,过古稀的他将诗歌创作推向又一高峰,岁月的风霜为他的诗歌增添更多沉思与通透,收入2005年诗集《违法者指南》的怀古诗《扎赫拉》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扎赫拉是位于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城西的中世纪穆斯林行宫,名字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美观”。公元9世纪北非穆斯林攻占比利亚半岛,在其南部统治数百年之久。阿卜杜·拉赫曼三世这位后倭马亚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是当时穆斯林西班牙的最高权威,在任期间改造建成了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和文化中心科尔多瓦。扎赫拉正是他的行宫,光彩令世界炫目。经历千年岁月变迁,如今的扎赫拉,残缺的马蹄拱依然伫立,只是朱颜改,卡瓦耶罗·伯纳德立于废墟之上连续发问——“宫殿花园精妙的顶峰/建造它们的人/可曾隐约预见它短暂的伟大,知晓它易逝的浮华?”;“那些人此刻企图/漫不经心窃取或掠夺/被毁坏的神奇,他们知道残存的只是遗迹吗?”;“挖起战利品的/子子孙孙,他们怀疑过自己永远/无法恒久保存/路面,嵌板,立柱,雕带,浴池,厅堂,渡水槽,庭院吗?”对于这些问题,寄蜉蝣于天地或许是最好的答案,诗人在瓦砾间漫步,注视这最不寻常的美丽,诗的尾节突然低声祈祷——“就让/那废墟永远是废墟,/石块拒绝其他并非皇族的石块,/慈悲地让/那些死去的埋葬它们的死人。”

八十大寿时,卡瓦耶罗·伯纳德曾表示:“要



卡瓦耶罗·伯纳德笔之作《战间》

去年4月23日,西语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去世纪念日之际,86岁高龄的西班牙作家何塞·马努埃尔·卡瓦耶罗·伯纳德获颁塞万提斯文学奖。颁奖词中盛赞他为“小说家诗人”、“语言运用的大师,故事的讲述者与创造者”。塞万提斯文学奖享有西班牙语文学界的诺贝尔奖之名,是对以西班牙语为创作语言的作家最高的奖赏。此前卡瓦耶罗已经几乎囊括西语文学界的各项大奖,包括西班牙国家诗歌奖、以西班牙王后索菲亚命名的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加西亚·洛尔迦国际诗歌奖等等。而获得塞万提斯奖可谓他作家生涯的终身成就奖,因为恰在2012年初,卡瓦耶罗在出版3000行自传体长诗《战间》之后已经宣布封笔:“我已经很老了,我想我再不需要写作更多。对我我做到的已经很满足。”的确,从1952年到2012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卡瓦耶罗笔耕不辍,不仅创作了11本诗集、5本小说和3本回忆录,还出版了关于安达卢西亚传统音乐、舞蹈、红酒、古巴革命等主题文集以及对贡戈拉、塞万提斯等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巨匠的文论集数种,涉猎之广泛令人称奇。

何塞·马努埃尔·卡瓦耶罗·伯纳德1926年出生于西班牙南部,父母都是古巴人,他本人在西班牙长大,后移居拉美多年。可以说,西班牙与伊比利亚美洲在文学创作上的渊源都在卡瓦耶罗·伯纳德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的诗歌将西班牙地缘传统中最民族、最大众的元素与大洋彼岸的现代主义风格结合起来,既有安达卢西亚的深歌音韵,又不乏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印迹。作为在佛朗哥独裁统治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卡瓦耶罗·伯纳德在青年时代目睹并亲历了最严苛的思想禁锢和文字审查,他开始想方设法阅读当时被禁止的书,并将这种选择书并与书分享一段冒险旅程的经历视为“演练自由”。他最初的阅读记忆来自杰克·伦敦、埃米利奥·萨尔加里、罗伯特·斯蒂文森和何塞·德·埃斯布隆塞达,野性的呼喊里,海盗之歌以大海为祖国的澎湃激荡着卡瓦耶罗·伯纳德年轻的心。然而与纸上文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之所及的黑暗。在回忆录中卡瓦耶罗·伯纳德曾这样书写那段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日子:“1952年我来到马德里。那是一段非常黑暗且

充满敌意的岁月。马德里到处都是战争的遗骸:饥饿、恐惧、寒冷、惶惶不安……那是一段艰难而伤痕累累的学习经历。”当时的马德里经过内战炮火的侵袭,是一座被划分为胜利者和战败者的城市。在黑云压城的气氛中,所有的思想禁锢与孤立无援都成为卡瓦耶罗·伯纳德写作的灵感源头。在那个“牲口比人更有尊严”的马德里,他看见“人们盖着布满油污的报纸”,“下水道里喷出孤僻的烟气”。他走过街头巷尾,感觉自己像一个“入侵者,告密者,同谋犯”。正如他在《立体地画》一诗结尾所写:“过去所有的暗潮涌动/惯例地变成/我明天拥有的记忆。”哪怕在多年以后,当独裁时代伴随着时间流逝渐行渐远,记忆中的那座城与城里的人依旧是卡瓦耶罗“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公民的史前史”。

在马德里,卡瓦耶罗·伯纳德继续学习文学,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预言》。诗集明显饱含青春的热烈,诗人通过对细节的人微描摹展现感情的层层推进,让情绪自然积累至顶峰,丝毫不显唐突。在诗歌《等》中,卡瓦耶罗首节连续使用“胸膛”“眼睛”“手”“嘴”等微距感官刻画爱人的等待与低至尘埃的心——“你对我说/你交出胸膛为了等我, /你的眼睛疼痛因为永远看不见我的身体, /甚至你的手都失去触觉/不能在空气里摸索我的缺席, /你说你忘记了我的嘴灼热的形状。”同时,这样的书写也铺垫了诗歌末节的脚踝——“你的影子几乎要暴露自己, /你几乎不确定/黑暗中你的身体/和我的身体之间的距离。”很快,卡瓦耶罗·伯纳德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少顷记忆》和取名自希腊神话的第三本诗集《安泰》。从预言到记忆,诗人将目光由未来移回过去。又或许,他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独特的关联。《少顷记忆》中的名篇《我的记忆是我自己的预言》仅是诗题已经体现出这种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诗中的“我”每个夜晚都回到记忆的房间,独自面对那里保存的岁月,面对反复纠缠的遗忘与欲望同时会合于此。历史不过螺旋形地前进,过去重演于未来,墙壁里重新生出腐朽,就是历史重建的闪光。于是可以在记忆里想象毁灭——“我的记忆是我自己的预言: /我盼望成为已成为的自己。”1959年卡瓦耶罗·伯纳德的第四本诗集《死去的时间》获得

波斯坎奖。此后他开始为诺奖得主何塞·塞拉的杂志担任副主编。

及至上世纪60年代,卡瓦耶罗·伯纳德移居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并与当地的文学杂志《神话》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杂志的编委之一是《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几年成为卡瓦耶罗·伯纳德人生经历中不可多得的时光,波哥大更是成为他笔下“最喜欢故乡的故乡之一”。回到西班牙后诗人曾这样深情回忆道:“我有很多故乡,其中一些比其他更恒久,波哥大就是这样的故乡。我在国立大学教了三年书,有了第一个儿子,写了第一本小说,我曾在它汹涌的河流中畅游,在它神秘的丛林里迷失。这一切都令人难以忘怀。那里与我的个人生活及文学生涯息息相关。”在拉美生活的经历让卡瓦耶罗·伯纳德有机会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尤其是渐渐消亡的土著文化,并由此开始重新审视400多年前那场地理大发现。眼前那片神奇的土地令他不禁重新思考,16世纪西班牙凭军队和宗教实现的征服里,谁才是被征服的一方。在《反转历史》一诗中,卡瓦耶罗·伯纳德以阿拉伯先知的话“所以你们将是胜利者,因为/你们是被毁坏的一方”为开篇慨叹“那些某王失去的,永远/无法再修复”,因为“一场用十字架进行的缓慢掠夺/千枯了母亲河的河岸,通向/大海,从前那里/带来知识/和接连不断野蛮的军队”。在诗人眼中,那段历史充斥着“士兵的牧场,教士的战利品”,只称得上是“被贬黜的圣物”。西班牙征服者在新大陆上“用另一种文化/雕刻这富饶宽容的

做一个不沉默的人,把思想与生命等同起来,就能重获青春。”也许,塞万提斯奖的确是他文学生命最好的总结,不仅因为奖项的重要,更因为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游侠骑士,卡瓦耶罗·伯纳德游历四方,以笔为剑,本着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对历史与责任的思考,不停写作,一如西班牙王储费利佩为他颁奖时所言,“这种不安定,有时被理解为不屈服,是卡瓦耶罗生命和文学轨迹中的重要元素。”巧合抑或预言,“卡瓦耶罗”在西班牙语中恰是“骑士”之意。

我的记忆是我自己的预言

□何塞·马努埃尔·卡瓦耶罗·伯纳德

我回到那房间,每个晚上都在里面
独自一人,它无法修复的镜子里存着
已经堕落的岁月。
那里,缚住双手的见证中间,
是我静止的生命,易变
责任里的代价。

木头,
台灯的震动,致幻的
窗玻璃,家具
脆弱的职业,胚胎中
保存岁月持久的
追溯,记忆
厚实的肉体,所有
纠缠我的
遗忘与欲望同时汇合。

尚可复原的世界,鲜活
聚合起来漫透墙壁
墙里重新生出腐朽。
历史重建的闪光
集起爱的所有不完美。
(奥,黑暗的房间,在诅咒时代的
信号灯下突然透明。)

从夜的里面响起
光的痕迹。我独自一人,我的双手
已被否认,已全交出,
角色分派(这个是爱,那个
是梦),被遗忘的侧影,挫败的
预言。
在那里我遭受重击的生命
每一天都被记忆刺穿。

想象我的毁灭吧,
多少已死的让毁灭再次实现。
我的记忆是我自己的预言:
我盼望成为已成为的自己。

动态

班维尔新书《无限》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本报讯 近日,爱尔兰小说家约翰·班维尔新书《无限》发布会在上海举行。爱尔兰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以及《无限》的翻译殷书林、学者戴从容等与读者就班维尔的创作以及爱尔兰文学展开交流。

班维尔1945年出生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其小说风格精准,冷酷、充满辩证色彩,同时兼具纳博科夫式的创新。他主要的作品有《哥白尼博士》《开普勒》《牛顿书信》《证据之书》《幽灵》《雅典娜》《无法企及》《裹尸布》《海》和《无限》等。《海》获得2005年布克奖,班维尔也曾于2011年获弗朗茨·卡夫卡奖,2013年获爱尔兰笔会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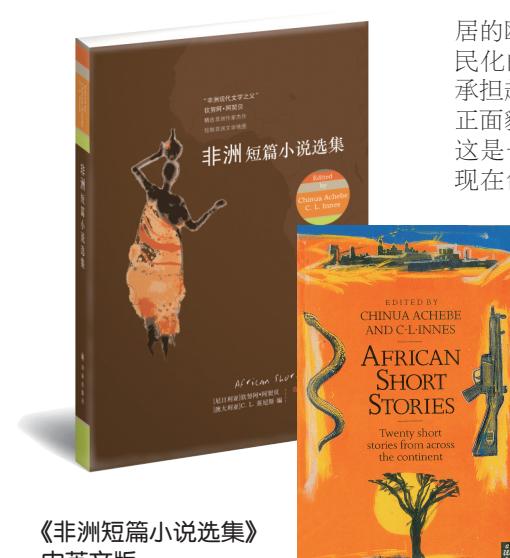
殷书林认为,《无限》是《海》之后的第一部“班维尔式”小说,非常有吸引力。《无限》中,作者运用了物理时间叙事、意识流、元叙事等多重叙事手法构建作品,并借用赫尔墨斯之口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观点:“总之,我想让你们承认并接受:你们生活的本质是悲剧性的,并不是因为生活是残酷或者忧伤的——忧伤和残酷与我们何干?而是因为

生活原本如此,命运是无法避免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你们会死,会进入一个仿佛你们从未进入过的状态”。

约翰·班维尔曾说过,爱尔兰文学分为两个传统,一个是乔伊斯的传统,一个是贝克特的传统,他认为自己承袭了贝克特的传统。戴从容认为在对世界的解释上,班维尔与贝克特的观点是相似的,班维尔意识到人类是孤零零的被抛弃在地球上,他的作品深刻地思考着: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谈到班维尔的语言,戴从容认为,班维尔完全可以写出通俗小说,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但班维尔明白,在小说中使用传统语言,将又引着读者进入老套的世界中。但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难以琢磨,传统语言没有办法表现这种不可琢磨性,所以一定要改变叙述方式。读者在阅读班维尔之后会发现,原来周围的人是这样神秘地存在着,而且彼此之间没有办法达到传统所想象的交流和理解,人生活在世界上的很多意义必须要用班维尔式的语言才能传递。(世文)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文学中的非洲

□韩继坤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
中英文版

英国海涅曼出版社的“非洲作家系列”是将非洲作家和非洲文学介绍给世界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半个世纪中出版了数百部非洲文学作品,囊括了众多代表性作家。阿契贝就曾担任过此丛书的顾问编辑,力求在非洲和世界之间架起文学沟通的桥梁,《非洲短篇小说选集》就是阿契贝精心编选的一部作品集。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包含了40篇短篇小说,其作者基本代表了非洲文坛,编选者在以基本文学品质为标准的基础上,“留意到体现不同地区、性别和年代的作家的优势”,真正从短篇小说的视角,从不同维度体现非洲的文学世界。书中既有纳丁·戈迪默、本·奥克瑞、阿西娅·杰巴尔等有着国际声誉的作者,也有米亚·科托、恩古吉·瓦·提安哥等代表各自国家文学成就的作者,还有众多潜心创作的新锐作者等。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代、背景各异的作者,共同构成了非洲短篇小说最优秀的创作者群体,他们用短篇小说来表现非洲文坛的另一种成就,向读者描绘出具有绚丽色彩的真实非洲世界。

就书面形式而言,非洲的文学传统可能并不久远,然而以口述形式传递的文学,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丰富和鲜活的文化财富之一。在民族种类繁多、文化背景复杂而又在很长时期缺乏固定书面语言的大陆上,依靠人们口口相传而得以保存的智慧和想象的结晶,无疑是他们最高的文学成就。相较长篇小说而言,这种文学传统对戏剧、短篇小说或者诗歌的影响更大,这些文学形式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来源。除了承担传递群体的共同记忆和创造功能的神话和寓言之外,还有讲述私人经验和想象的“夜里讲的故事”,这些有着群体和个人双重记忆和创造的文学形式,共同构成了短

居的欧洲殖民者后裔——随着非殖民化的进程逐渐掌握了话语权,便承担起这项以本地视角展示非洲真面貌的任务。对于非洲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首先表现在创作语言的选择上。以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为首,提倡使用非洲本土语言,认为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是“压制进步思想的新殖民主义结构的一部分”。但阿契贝看到了殖民者语言的另一面,他说:“在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的逻辑中,英语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武器,可以用来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战斗……它并非只是你掌握的所以就使用的东西,而是可以积极运用的有效武器,能对抗殖民化。”纳丁·戈迪默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可以之解放自身。在选集中,众多非洲本土作家以殖民者语言来讲述非洲土地上的故事,构建非洲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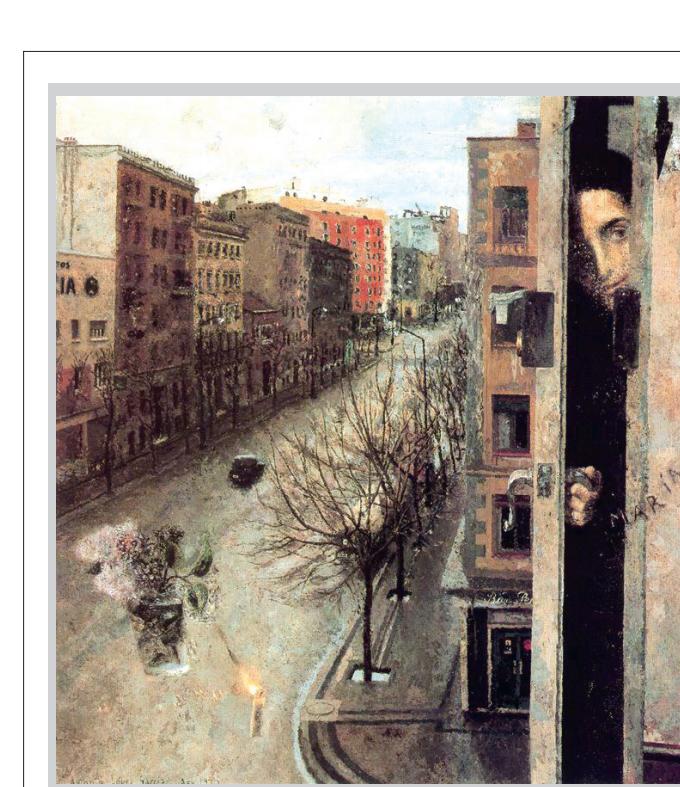
选集中的作品来自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北到阿尔及利亚,南到南非,东到索马里,西到塞内加尔,所关注的人与事因这片大陆在种族、宗教、文化等构成上的复杂性而有所不同,但不同中又存在着共性。

对几乎所有非洲国家而言,遭受殖民统治是都有过的经历,而在20世纪,脱离殖民统治,追求独立,又成为它们一起经历的历史进程。选集中的多篇作品均有所体现:《学徒》描述了非洲土著部落遭受殖民者入侵,原有统治秩序消亡;《丛林里的绅士》以寓言形式讲述殖民者如何鸠占鹊巢,被殖民者又如何以智慧消灭殖民者,获得自由;《织布鸟》也运用寓言的形式,讲述了西方殖民者如何培养本地的所谓精英成为本土文化的自觉扼杀者,对西方

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蜘蛛网》和《国内和平》走得更远一些:前者提出了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原来为之奋斗的受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的尖锐问题,引人深思;后者的主人公在内战结束之后,仍然无法实现基本的安全保障,所谓和平不外如是。而关于独立之后的非洲又将走向何处,《荒原之地》和《离巢》或许可以看到一点影子。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均奔向西方,学习代表现代文明的科技,只是《荒原之地》中的尼古拉斯完全迷失在西方文明中,以疯癫告终,而《离巢》中年轻的阿鲁是能够吸收西方文明的优势为其所用,还是被其压倒而崩塌,或者完全化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尚未可知——这是否也是非洲自身的前景?

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则主要在南部非洲进行,尤其是南非。纳丁·戈迪默的两篇作品《新郎》和《特赦》均体现了这一主题,而戈迪默身为白人,说明这种斗争是不分肤色的。在《新郎》中,音乐意外地消除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隔阂,其结尾也暗含了黑人白人正如新郎新娘一样,终将结合到一起之意。政治并非惟一内容,比如《绿叶》《关卡》基本放弃了这些宏观的观照,而以小人物为中心,以情节的急转直下营造出幽默的氛围,《古巴什家的意外》则在幽默之外散发着浓厚的母女深情。

与世界文学交流日渐密切的非洲文学在创作上并非封闭的独立存在,而是会积极尝试外来的各种创作手法。例如《南方传来的消息》和《觉醒吧……》中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而《神鸟》和《原生生物》中则可见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姿态——别种文化的语言和创作手法均可为我所用,传达我之思想,塑造我之形象。不同的面向相互叠加,才能构成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非洲。



西班牙画家安东尼奥·加西亚·洛佩斯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